

疑经变古思潮中的宋代易学考辨

张 涛 任利伟

摘要: 在宋代的经学领域,疑经变古思潮渐趋兴盛,促使易学考辨多维度、全方面展开。北宋欧阳修首先向孔子作《易传》(《十翼》)的传统观点发难,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也由此成为易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备受关注。南宋学者又进一步深入,或借之佐证、充实自身的理学思想体系;或藉以批判理学空疏的“义理”、“心性”。肇始于宋代的易学考辨对中国传统经学史、易学史乃至辨伪学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宋代;疑经变古;易学考辨;《易传》;《十翼》

中图分类号: B2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2-0004-07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就易学领域而言,宋代的历史地位同样也是如此。其中,易学考辨特别是关于孔子是否作《易传》(《十翼》)这一问题的考辨,又是与当时的疑经变古思潮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宋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规律。笔者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成为政治、学术上的权威,儒家经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敬畏儒家经典的神圣,一些学者在解经时往往只注重文字的疏通而轻于义理的阐发,扼制了儒家经典内在价值的不断开掘和发挥,传统经学逐渐陷入困境。特别是汉儒解经只知笃守家法,每每囿于旧说,“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

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②。唐代颁行《五经正义》,主张“疏不破注”或“疏不驳注”,不只是对经书,甚至对汉人所撰的经书传、注等也不得轻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学的发展,使得传统学术承袭有余而创新不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佛、道二教获得迅速发展,尤其是佛教以其理论的精致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经学的地位则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唐代中期,要求对经学进行变革的呼声开始悄然兴起,其中啖助、赵匡、陆淳以及韩愈、柳宗元等人都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开启了经学变革的先声。

宋朝建立之初,学风仍承唐之余绪,还有些保守,但解经不拘传注且注重探求义理的学术风气一直在潜流暗涌。仁宗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渐趋加剧,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政治改革大潮的激荡下,经学研究领域内又再度焕发生机,出现了一股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势头。为促成学风的转变,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敢于指陈旧说,独抒己见,一方面通过改革科举制度,要求考生鄙薄章句,不惑传注,注重经义的阐发,一方面又自己身体力行,怀疑经传,引导传统经学的变革,最终形成了左右社会时局、影响学术走向的疑经变古思潮。肇始于庆历时期的疑经变古思潮,既与当时的儒学复兴运动大致同步,又与摒弃章句注疏之学、倡导义理之

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收稿日期:2008-11-11

作者简介:张涛(1961-),山东临清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易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任利伟(1973-),河北廊坊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文献学。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

学的经学变革相承接，彼此包容，相互促进。以熙宁年间王安石《三经新义》的颁布为标志，以章句训诂为特征的汉唐章句之学向以自由说经为特征的义理之学的转型最终完成。

在疑经变古思潮中，北宋学者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及至南宋，这一思潮并未停滞。除了沿袭北宋欧阳修的疑经路数，重视文献依据，多着眼于经学形成的过程来展开考辨外，南宋的疑经变古思潮又更多地与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形成互动之势，出现了以理学调整、修正现存儒家经典，为其学术体系奠基的崭新气象。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后期，随着时局的日益危沉，一些学者坚持“义理”与“事功”并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义理的学风提出了严厉批评，希望从经史百家中探索出有益于当今之世的致用之学。于是，为学要切于实务之风开始盛行。从一定意义而言，这对宋代疑经变古思潮的进一步深化，对辨伪思想及其方法的进一步完善，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二

众所周知，《周易》由《易经》和《易传》（《十翼》）两个部分组成。《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从《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开始，一直到隋唐时期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大都认为是孔子所作。随着中唐时期变古之风渐起，特别是唐代后期，一些学者考订经传文字，在并无版本依据的情况下，更多地凭借文义进行推理和判断，已经呈现出考辨《周易》的新的学术旨趣。北宋经学更是不再为旧说所囿，创新意识渐趋增强。在此背景下，欧阳修撰《易童子问》等著作，通过否认孔子作《十翼》中的部分篇章，率先在易学领域刮起了更为强劲的变古之风。其易学考辨所表现出来的疑经思想、辨伪方法对当代乃至后世的学术发展极具引导和推动作用。

欧阳修认为，《系辞》和《文言》绝非孔子所作。在他看来，孔子所说的“系辞”是“爻辞”。“夫系者，有所系之谓也，故曰‘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其为辞各联属其一爻者也，是则孔子专指爻辞为系辞”^①。欧阳修所持根据有

三：一是“孔子言‘圣人设卦系辞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为‘系辞’，不必复自名其所作又为《系辞》也”^②。二是“况其文乃概言《易》之大体，杂论《易》之诸卦，其辞非有所系，不得谓之《系辞》也”^③。三是《系辞》文字“是皆险怪奇绝，非世常言，无为有训诂、考证，而学者出其臆见，随事为解，果得圣人之旨邪？”^④由此，欧阳修断言：“今乃以孔子赞《易》之文为上、下《系辞》者，何其谬也！”

既然《系辞》不是孔子所为，那么《文言》是否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欧阳修将《文言》与《论语》类比，进而指出：“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应自称‘子曰’。又其作于一时，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发明之”。“乃知今《周易》所载非孔子《文言》之全篇”。其原因在于“盖汉之《易》师择其文以解卦体，至其有所不取，则文断而不属，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⑤。可见，欧阳修单就通过仔细辨别“子曰”与“何谓”的使用情境，进一步断定《文言》非孔子作。与此同时，欧阳修又找到了《文言》中其他“自相乖戾”之处。例如，关于“元亨利贞”，《文言》既说是乾之四德，又说是“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欧阳修认为，这两个说法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元亨利贞”乃古之占辞，“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彖传》解释其为“不道其初”，也没有说成是四德。而且，根据《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四德说源自穆姜，早在孔子未生之前，所以《文言》亦非孔子作。

值得关注的是，欧阳修对《十翼》的考辨特别重视从“人情”出发，这种“人情”实则是“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凸显出一种严谨的理性精神。欧阳修认为《系辞》、《文言》等篇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繁衍丛脞”。在欧阳修看来，孔子之文章，如《易》、《春秋》原本“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在《文言》、《系辞》中，关于系辞以明吉凶仅这一个意思就有先后出现多次，繁复芜杂。而且欧阳修注意到：《系辞》认为八卦的产生

中国书店，1986年，第473页。

②《居士外集》卷15《传易图序》，第473页。

③《居士外集》卷15《传易图序》，第473页。

④《居士外集》卷15《传易图序》，第473页。

⑤《居士外集》卷15《传易图序》，第473页。

①《居士外集》卷15《传易图序》，《欧阳修全集》本，

是“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而《说卦》则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就连八卦的产生也说法不一且彼此牴牾，让人无所择从。所以，欧阳修指出：“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说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①？正是以“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欧阳修此举才做到了“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②，而不至沦为徒呈匹夫之勇，其相关结论也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欧阳修虽然认为《系辞》、《文言》等篇皆非圣人之作，却没有完全否定《系辞》、《文言》与孔子的关系，没有完全抹煞《系辞》、《文言》、《说卦》、《杂卦》存在的价值。就《十翼》与孔子的关系而言，欧阳修认为“其源盖出于孔子而相传于《易》师也”，“其间转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③。诚如所论，如果不顾事实，盲目崇拜，一定以为是“圣人之作”，那就会“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④；反之，如果对之考订真伪，不曲为之说，还是能够从中发现其“益于学”的价值。“《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⑤。这一认识是很有学术启发意义的。所以，继欧阳修之后，王开祖、司马光、金君卿、李清臣、刘安世等人也曾对《十翼》中的某一篇或几篇表示怀疑。

然而，欧阳修对《十翼》的考辨在当时亦招致了一些反对之声，这既有传统思想观念对欧阳修之论的不认同、不接受，也与欧阳修的考证尚存在一定疏漏之处有关。毕竟，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欧阳修欲从思想层面寻求突破以应用于人事，这种

急切的功利主义倾向也是再所难免的。但是，欧阳修以其力排《系辞》的首创之功和辨伪学识，在易学文献、易学思想领域，特别是在孔子是否作《十翼》的问题上所激发的连锁反应，还是值得称道的。

三

正是受到疑经变古思潮的冲击，北宋学者的经学成就有不少都是开创性的。在此基础上，南宋时期的理学蔚然大观，又为这一思潮的进一步拓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许多理学家与易学有着某种不解之缘，有的本身就是易学大师。理学家解《易》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探讨儒家经典文本的微言大义，其深层用意还在于依托《周易》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在理学内部，针对同一易学问题所作的考辨，往往也会因立场不同而截然两途，尤其是在孔子是否作《十翼》的问题上。

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不赞同欧阳修的观点，而坚信《系辞》为孔子所作。朱熹认为：“欧阳作《易童子问》，正王弼之失数十事，然因图书之疑并《系辞》不信，此是欧公无见处。”^⑥对欧阳修排击《系辞》，朱熹不以为然。而且，在朱熹看来，欧阳修“极论《系辞》非圣人之书”，有可能误导后学，应该“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而不应“以为圣人之作不敢取舍而尽信之”^⑦。朱熹能够秉持“公心通论”，不因前贤否定孔子作《系辞》而盲从，这种态度对经学辨伪乃至一切学术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但对于《十翼》中的《序卦》，朱熹又表示怀疑。当弟子问到“《序卦》或以为非圣人之书”时，朱熹指出：“先儒以为非圣人之蕴，某以为谓之非圣人之精则可，谓非《易》之蕴则不可”^⑧。“大抵古书多此体，如《易·序卦》亦是此类，若便断为孔子之笔，恐无是理也”^⑨。其中流露出否定《序卦》是孔子所作的倾向。

即便如此，朱熹还是承认“《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说法，而这一态度也直接影响到了他对《周易》究竟为何书的考辨。朱熹认为：“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象》、《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义只是要作卜筮

①《易童子问》卷3，《欧阳修全集》本，第570页。

②《易童子问》卷3，第568页。

③《居士外集》卷10《易或问》，第431页。

④《易童子问》卷3，第570页。

⑤《易童子问》卷3，第570页。

⑥朱彝尊《经义考》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⑦《晦庵集》卷7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朱子语类》卷77，中华书局，1986年，第1975页。

⑨《晦庵别集》卷2《孙季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用。如伏羲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阴阳刚柔吉凶之理，然亦未尝说破，只是使人知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到文王周公时，“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只有到得孔子时，才在卜筮上面生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吉，所以凶”，说得深刻、透彻。^①也就是说，无论是伏羲、文王，还是周公、孔子，尽管他们作《易》的内容有所不同，却都是将《易》看成是卜筮之书。既然《易》之本义是作卜筮之用，便不是义理之作。由卜筮生发出义理“非学者可及”，“此皆是圣人事”，也只有孔子才能从中见出圣人之道，“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但朱熹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再向前推，认定卦、爻未画以前，“只是个至虚至静而已，忽然在这至虚至静之中有个象，方说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可见，孔子由占筮阐发的理原本就具备于卦、爻之中了。不难看出，朱熹易学考辨的深层意味在于“盖《易》之为书，是悬空做出来底”，他对《易》理的探究与他认为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朱熹在孔子是否作《十翼》的问题上，何以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朱熹怀疑孔子作《序卦》是因为《易》之《序卦》体例类同《书》之小序，“大抵古书多此体，如《易·序卦》亦是此类，若便断为孔子之笔，恐无是理也”。这一点先已提及，表明朱熹确实有自己的判断依据，秉持了学术上的“公心通论”。另一方面，为使其理学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必须要有孔子等圣人的义理作依据，以夯筑其更加牢固的理论基石。如不承认《十翼》为孔子作，朱熹的易学观、经学观也就失去了前提。当然，应该注意的是，朱熹最终认为孔子作《十翼》，也不排除囿于传统说法、考辨不细致等因素。

虽同属于理学疑经，陆九渊建立的心学一派，其取向却与朱熹不同。陆九渊主张“心即理”，即通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来张扬主体精神，认为“昔人之书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盖

书可得而伪为也，理不可得而伪为也”^③。这就对这一时期疑经变古思潮的进一步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陆九渊的弟子及其后学更是秉承师传，对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其中，杨简的表现得尤为引人注目。

针对《系辞》的作者问题，杨简认为不全是孔子所作，仅仅是“期间得之于孔子者多矣”，并在《己易》中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证。“‘吾道一以贯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与天地准’，此亦非孔子之言也，天地即易也。幽明本无故，不必曰‘仰观’、‘俯察’而后知其故也，死生本无说，不必‘原始’、‘要终’而后知其说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自己说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继之者善也’，离而二之也，离道以善，庄周陷溺乎虚无之学也，非圣人之大道也。”“‘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此孔子之言也。圣人即易也，德业即易也，继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离易与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间有微碍者，传录记述者之差也，其大旨之善也；不系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圣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非圣言。”^④杨简以上所论，正如他给自己的易学著作命名为《己易》一样，以自己之心为易，全由己意考辨。因为按心学观点，天地间万物、万事、万理无不皆我心所固有，所以杨简认为：“善学易者求诸己，不求诸书，古圣作易凡以开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诸己而求诸书，其不明古圣之所指也”。正是因此之故，天地与圣人、易与天地绝不能析分为二，既然乾与坤都是易，而易已具于我心，其形上形下等诸如此类的对立关系便不复存在。

应该看到，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朱熹，他们对孔子作《十翼》的考辨，均程度不同地坚持了历史的和文献的客观标准，而在杨简那里，则主要是以心学理论来判断孔子言论的真伪，坚持《十翼》并非全为孔子所作。这样一来，其中的客观依据亦几乎荡然无存，他的易学考辨也就真正为“学苟知本，

①朱鉴《文公易说》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朱子语类》卷1，第1页。

③《陆九渊集》卷32《拾遗》，中华书局，1980年，第380页。

④杨简《慈湖遗书》卷7《家记一·泛论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六经皆我注脚”的心学主张作了最好的“注脚”。

四

虽然南宋时期的理学集北宋之大成，思想体系得以最终确立，而在理学之外，随着南宋社会日益羸弱，重事实功的思想渐渐抬头。一些有识之士联系时局，起而批判理学“义理”、“心性”的空疏、无用。这一鲜明的态度在经学考辨尤其是在对孔子是否作《十翼》的考辨中也相当突出地表现出来，其中，永嘉学派的叶适就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如前所述，自《易传》提出“伏羲画八卦”之后，从汉代的司马迁一直到唐代的孔颖达都尊奉此说。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究竟为谁所演，虽然《易传》作者没有确定，但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文王所作。叶适根据《周礼》所载则认为，所谓“伏羲文王作卦重爻”的说法“与《周官》不合，盖出于相传浮说，不可信”^①。“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又四。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详此，则《周易》之为三易，别卦之为六十四，自舜禹以来用之矣。而后世有伏羲始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又谓纣囚文王于羑里，始演《周易》”，“学者因之有伏羲先天、文王后天之论，不知何所本始”^②。也就是讲，“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仅仅是“相传浮说”，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学者应该重在有根有据地考察，不能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后世之言《易》者，乃曰‘伏羲始画八卦’，又曰‘以代结绳之政’，神于野而诞于朴，非学者所宜述也。”^③正基于此，叶适对《周易》一书的性质也做出了明确判断。“然则《周易》果文王所改作，而后世臣子不以严宗庙，参典谟，顾乃藏之于太祝，等之于卜筮，何其媒嬖先君若是哉？”^④显然，《周易》不过是藏于太祝的占筮之书，把它说成是周文王所改作也是与史不符的。“《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周有司所用也”。至于《易》的真正作者，在叶适看来，根本无从知晓，索性明确指出“《易》不

知何人所作”^⑤。

前已提及，欧阳修怀疑《十翼》非孔子所作，仅仅是削去了其中除《彖》、《象》之外的六篇，在当时已经是石破天惊，而叶适在怀疑“伏羲、文王作卦重爻”的基础上，对孔子作《十翼》的说法，无论是在怀疑的范围上，还是在怀疑的程度上，比欧阳修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言‘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言》之属’，亦无明据。《论语》但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而已，易学之成与其讲论问答，乃无所见，所谓《彖》、《象》、《系辞》作于孔氏者，亦未敢从也。”^⑥叶适对孔子作《十翼》在总体上是怀疑的。但是，叶适又认为，“《彖》、《象》辞意劲厉，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其为孔氏作无疑”^⑦。“孔子独为之著《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⑧。叶适似乎又肯定了《彖》、《象》二篇为孔子所作。这样一来，就与前面在整体上怀疑《十翼》为孔子所作的观点相悖。

对于叶适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学人中批评者不少，大都认为是叶适认识上的局限所致，但对其中原委很少探究。其实，在叶适看来，《十翼》中的《彖》、《象》最能反映孔子之本义、表达圣人之真义。而当时一部分学者对最能反映《易》之本义、孔子真义的《彖》、《象》不甚重视，反而对《十翼》中的“浮称泛指”、“去道甚远”之篇津津乐道。对于这一学术怪相，叶适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正如他在评论《乾卦》时所言：“乾《文言》详矣，学者玩《文言》而忘《彖》、《象》。且《文言》与上下《系（辞）》、《说卦》、《杂卦》之说。嚶嚶焉皆非《易》之正也。”^⑨“按上下《系（辞）》、《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鄙，于《易》有害。”^⑩这就是说，叶适否定的只是孔子作《十翼》之说，并没有否定《十翼》中有最能反映圣人本义的内容。叶适恰恰是要通过此举，在学术研究中起到一种匡谬纠偏的作用。

①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3《上下经总论》，中华书局，1977年，第35页。

②《习学记言序目》卷7《春官宗伯》，第88页。

③《习学记言序目》卷4《周易四·系辞》，第39页。

④《习学记言序目》卷7《春官宗伯》，第88页。

⑤《习学记言序目》卷49《序》，第739页。

⑥《习学记言序目》卷3《上下经总论》，第35页。

⑦《习学记言序目》卷3《上下经总论》，第35页。

⑧《习学记言序目》卷49《序》，第740页。

⑨《习学记言序目》卷1《周易一·乾坤》，第1页。

⑩《习学记言序目》卷4《序卦》，第50页。

不仅如此，叶适还将否定《十翼》为孔子所作与对理学道统论的批判紧密地联系起来。首先，叶适将批判理学的“太极”观作为突破口。“‘《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义所未及。……无所不备矣，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始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源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回归，而道日以离矣。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文浅而义陋矣。”^①确实如叶适所言，孔子述《易》根本没有说到“太极”问题，将“易有太极”归于孔子的名下毫无道理可言。“太极”这个概念本来自道家，作为虚无之祖的老聃都没有提出，传《易》者倒把这些概念挂于圣人（孔子）名下以“骇异后学”。这样，只能与儒家之“道”愈行愈远。何况理学家的宇宙生成模式是脱胎于《系辞上》的“《易》有太极”，而这一“宗旨秘义”“文浅而义陋”，没有任何的神秘之处。

与此相联系，叶适也就顺势揭出了理学的实质：“本朝承平时，禅说犹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期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②在叶适看来，理学援“《十翼》以自况”，以迎合佛老思想；视《十翼》为孔子作，以建立接传圣人之道统。理学的体系本身与儒家真传背道而驰且不说，“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③。既然源头不存，那么道统何在？至此，叶适一再坚持的《十翼》非孔子所作的真正目的得以彰显：借“《十翼》非孔子作”反对理学欲“一以贯之”的道统论，从而真正地为当时以程朱为代表

的理学家们的“淫诬怪幻”言论担当起“条其大指，稍厘析之”^④的大任。

除了杨简、叶适，在南宋学者中，对《十翼》或其中的一篇或几篇进行辨疑的，还有郑樵、赵汝谈、吴仁杰、王柏、金履祥等人。他们认为，《十翼》的部分篇章的作者，或为孔子门人，或为后世经师，说法不一，但都是与杨简、叶适之说相呼应的。

五

综上所述，宋儒在疑经变古思潮中，不仅仅是希望通过全面的考察、整理文献，使现存的先秦儒家经典恢复固有风貌，其最终目的是要在此基础上还圣人思想的本来面目，藉此能够真正转变社会风气，实现经世致用。“疑经”并不是否定六经元典，而是在对六经元典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突出“尊经”、“崇圣”的意识，以恢复经学的活力，恢复经典的权威，藉此实现儒学的再次复兴。同时，“疑经”又必须以“变古”意识为前提。宋儒这种强烈的“变古”意识虽然是为了“复古”，但这种“复古”又是通过宋儒“与时偕行”，以排斥汉唐注疏传义、独自阐发儒学经典大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其间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有宋一代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又包含了以复古为开新的因素，从而使儒学思想在宋代呈现出崭新的形态和面貌。因此，宋代疑经变古思潮所体现出的儒学更新的思想意识，不仅为宋儒易学考辨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提供了思想动力和方法支持。宋代的易学考辨能够得以持续深入、广泛的展开，确实得益于此。

在宋代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十翼》是否为孔子所作，每每被置于浪尖风口之上，始终作为各家学派争论的焦点而无法回避，其中的思想动因应当引起足够重视。欧阳修考辨《十翼》是他有感于时代风气，致力于维护、复兴儒学使然，以期达到完善经学体系和尊经崇圣之目的。也就是说，欧阳修对《系辞》的怀疑，既有排击当时一度沉渣泛起之谶纬、佛老而重振儒学的考虑，又有促进经学形态变革，倡导以经学入世的积极因素。就理学内部而言，朱熹的易学考辨，虽也继承了北宋以来“理学疑经”的思路，但是在《十翼》作者的问题上，对欧阳修的辩驳，往往是更多的围绕着其理学体系的

^①《习学记言序目》卷4《系辞上》，第47页。

^②《习学记言序目》卷49《序》，第740页。

^③《习学记言序目》卷49《序》，第740页。

^④《习学记言序目》卷4《周易四·系辞》，第39页。

构建展开,将之吸纳到自身所构建的理学“大义”之中。而在杨简看来,孔子作《系辞》之内容真伪取决于是否合乎其心学一派所崇尚的圣贤思想,取决于能否佐证其心学理论并为之提供更好的注脚。叶适认为《十翼》非孔子作,不乏学术传承的因素,因为叶适在治学上确实受到过欧阳修的深刻影响,“以经为正而不汨于章读笺诂,此欧阳氏读书法也”^①。更为重要的是,叶适的这一看法始终与永嘉学派一贯坚持的道义和事功紧密联系的学术主张相吻合,凸显出叶适试图扭转当时易学研究抛弃于今为用的圣人本意而陷入空谈、追求“义理”的思想倾向。尽管以上宋代学术名家考辨《十翼》立场各有不同,观点针锋相对,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宋一代疑经变古思潮的总体趋尚,表现出儒学更新的意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虽然在其具体的考辨过程中,求真的标准有时往往会屈从于致用的目的,无论如何还是在易学史和辨伪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欧阳修否定孔子作《十翼》不仅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且成为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大公案。明末清初,易学考据之风大兴,胡渭等人对宋代图书易学的精审考辨及猛烈批判,不能不说是与欧阳修肇始于易学领域内的《十翼》作者之辨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形成一股声势强劲的疑古思潮。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为“为打破汉人的经说”,“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②,将矛头直指传统易学。而古史辨派在《十翼》作者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自不待言,就直接受到了欧阳修以及宋代疑经变古思潮的沾溉和影响。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周易》的立场、方法较之前有所改变,但欧阳修的观点仍然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步入八十年代,随着相关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的不断发现,尽管学界中仍然有人在固守、坚持着《十翼》是孔子所作的经学旧说,但依然不能改变孔子不是《易传》直接作者的事实。

毕竟,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此乃学术演进、文化发展之大势。二十一世纪,易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拓展,新的学术方法的不断运用,更足以表明,包括《系辞》、《文言》等在内的《易传》与儒家

以及孔子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易传》绝非某一时期的某学者所为,更不是成于某一时期的某一学派。不只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倾向在《易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正因于此,《易传》才真正做到了“吸收百家,综合百家,又扬弃百家,超越百家”,“成为各家各派以自己的思想观念治《易》而又彼此影响、彼此交融的范例”^③。目前,学术界应进一步加强对宋代易学考辨的研究,并将其置于宋代疑经变古思潮的演变进程中加以细致考察,从而进一步丰富对宋代易学史、辨伪学史的认识,更好地展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基本规律。

Discrimination of Yi-ology in Song Dynasty in Trend of Classic-suspecting and Reform of Classic Studies ZHANG Tao REN Li-w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y reason of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rend of Classic-suspecting and Reform of Classic Studies gradually blossomed, which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lassic in deferent direction. Ou Yang-xiu, living in North Song Dynasty, was the first one who criticized traditional viewpoint that Confucius composed *Shi Yi*.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Shi Yi* became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Yi-ologyical discrimination. scholars in South Song Dynasty put this issue forward, they demonstrate and solidify their philosophy, or criticize emptiness in Confusion School of Cheng Yi and Zhu Xi. Discrimination of Yi-ology in Song Dynasty has great influence in traditional history of Yi-ology and Discrimination, we should acknowledge this adequately when we study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rend of Classic-suspecting and Reform of Classic Studies; Discrimination of Yi-ology; Yi Zhuan

(责任编辑:刘兵)

①《习学记言序目》卷47《五言古诗》,第703页。

②顾颉刚《古史辨》第3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21页。